

后记：媒介考古学与昨日重现

维维安·索布切克

所谓“在场”(过去存在于当下的隐含方式),至少和“意义”一样重要。

——艾尔克·鲁尼亚(Eelco Runia),《在场》(Presence)

考古学家应当齐心协力,去保卫那些被……帝国主义社会和人文主义话语……压制和“他者化”的集体中的次要部分。这个故事并没有被叙述出来……但是它作为一种静默的、有形的、可见的且毫无生机的物质遗迹来到我们面前。

——比约纳尔·奥尔森(Bjørnar Olsen),《文本之后的物质文化:事物的再记忆》(Material Culture After Text: Re-membering Things)

这两个题词,前者来自荷兰一位历史哲学家的一篇具有开创性的理论文章,后者来自一位挪威考古学家的“宣言”。这两个题词一下子吸引我的原因是,它们尤其与理解“媒介考古学”的任务密切相关,不管这门未成建制的学科是如何成分混杂,难以驾驭。和本书包罗万象的文章极为相似的是,这两个题词都是一种突出的表述,其内容是:最近出现的明显的物质主义,以及普遍的反叙事、反解释学话语(该话语关注的是,在何种情境下,缺席的过去能被称作当下的“在场”)¹。因此,这种话语同样关注“即时性”(immediacy)和“中介性”(mediation)的条件(和效应),即使它没有将特定的实体和形式明确地称作“媒介”。我将论述,这种关于在场的话语(一种“缺席的在场”),以及它对过去、对它得以重现(和进行史学交流)的条件特别关注,对于媒介考古学来说非常重要。然而,“在场”这一术语在此语境下意味着什么呢?

极端地说,“在场”在字面意义上被定义为跨历史的(并不是非历史的)传递,或者是转喻和物质的碎片或痕迹的继替,它们从过去穿越到“此时此地”——

这里的“此时此地”指我们在实践、操作和感觉上接触这些碎片或痕迹，使其再次被激活并变为现实存在的时间和地点²。不要与“天真的现实主义”混淆，这种在场的感觉萌生于认识论和感官的特性（既有物质上的，也有结构上的），这些特性不仅体现在理论或诠释的话语中，而且体现在可操作的（还必须是具体的）实践和知识中，即“认知的述行性动作，它注重‘做了什么’而不是‘再现了什么’”³。这种关于在场的观点无疑揭示了媒介考古学的诸多含义。事实上，本书中的许多文章关注的不只是恢复和描述那些先前被忽视或边缘化的媒介-历史人工制品，还有每个人工制品通过跨历史的操作实践所开辟的“技术-历史的事件”（认识论和感官上的条件得以产生）。对媒介考古学者来说，这种关于在场的观点强调了主要按照海德格尔的“技艺”（*techne*）术语来处理、测量、搜集和关注历史遗迹的重要性。这种技艺的力量在于它的解蔽作用：不仅使（这些历史遗产）“产生”，还“使其在场”⁴。实际上，这种对过去在此时此地的（字面上和哲学上的）在场的看法，和那些看似毫不相干的媒介考古学项目联系在了一起。例如，描绘日本 Baby Talkie 这种光学玩具在家庭中的实际用途，或者描述深层次的物理和结构操作，使陈旧的留声机（或现代计算机）显示为其自身的考古学家或“执政官”（*archon*）——为了观察和了解起见，只要特定的技术行使程序的力量和优先的权力，并由此为“系统的运行”建立认识论上的条件⁵。

从另一种极端言之，“在场”被定义为一种应运而生但虚幻的（和难以捉摸的）效应⁶。通过被注意到而突然“在那里”，以及通过检验以彻底地、回溯性地质疑和改变那些公认的事物秩序，带有罗兰·巴特“刺点”^①（*punctum*）作用的记忆碎片或痕迹，便穿透了平凡瞬间（和领悟）中的神秘之洞⁷。在媒介考古学中，一件被忽视的媒介人工制品（无论是现实存在的，还是仅仅为想象的和/或计划中的）似乎立刻变得既熟悉又陌生。因此，它的突然“在此”（并且一直“在那里”）产生了一种“在场效应”，这种效应能够推翻已建立的媒介等级制度和媒介历史的前提（及其理解）。实际上，本书中的许多文章源于一些离奇（而精确）的重新识别的经验，不仅重新识别一些边缘化或未获实现的技术设备（它们打断了媒介历史的连续性和目的论），而且重新识别跨历史的和主题性的在场——比如媒介和“小人儿”这种文学形态的话语结合，又或者是突然重新认识到，那些之前被我们当成机器“噪音”或电脑“人工制品”（在这个语境下是一个惊人的术语）以及媒介干扰物而被忽视的东西，实际上是媒介的系统性元素之一。

① 罗兰·巴特认为，好的摄影作品是有刺点的，它能够引起观者的思考甚至痛苦。——译者注

恰恰是意识到当下多种多样的断裂的在场(它是一种转喻的“缺席的在场”，不论其是否“真实”或产生某种“效应”)，日益增加了人们的不满：对艾尔克·鲁尼亚眼中诠释性历史叙述那令人窒息的隐喻或替代法(或者就像他说的历史“再现主义”)的不满。的确，在不同程度上，媒介考古学，包括本书文章，因对“再现主义”的不满，走上了与主流哲学、电影电视和媒介研究的诠释性方法、文化研究以及新历史主义不同的道路。因此，尽管媒介考古学和这些学科领域具有一些相近的特征和焦点，并且无可避免地进入“解释学循环”(至少它会将原本令人惊讶的对象当作媒介相关物考虑在内)，但是就如在场的话语一样，媒介考古学的取向通常是反解释学的。媒介考古学偏向于避免或延迟诠释性的分析说明以及目的论的使用方式，后者用于现实主义的历史再现，而现实主义的历史再现尝试通过一致的(和隐喻的)叙述来填补过去的空白，弥补其缺失。

在此方面，鲁尼亚将隐喻、转喻和再现、在场结合起来。他论述道：“在场不是用你手头的东西隐喻性地填塞空白的结果。只有转喻性地呈现缺席，在场才能更好地被激发。”⁸ 他继续说：“坚持这样做，是因为这些空白并不与我们脑海中已经存在的东西有关……隐喻在理性层面上提供了智力的欢愉，但是……转喻却在痛苦的层面击中了要害。”⁹ 然而，这是痛苦而不是情绪的一些简单形式，另外，它类似于朱莉亚娜·布鲁诺所说的“情感”(e-motion)——这个连字符强调了一种动态的传输形式和历史的传递性，它们使一些真实的事物可以触动我们的心灵¹⁰。

鲁尼亚认为，实际上只有通过面对历史的转喻，我们才能“一睹历史的神圣”，“使我们最终回到自我本身”¹¹。这一“神圣”作为在场或在场效应，被当作一种超常而非超验的启示而被体验(和著述)。也就是说，这种启示是历史性的，它跨越了过去、当下和未来之间的隔阂，不仅以某种方式将过去显露为永恒的当下，也以某种方式将当下与未来显露为永恒的未来¹²。因此，同样是注重历史转喻的媒介考古学家，有些人关注的例子是自19世纪80年代以来就极其稀有的定制版英国大型双镜魔术幻灯，有些人则关注当前的计算机代码(或构成代码的电流)，他们的差别并不像起初看上去的那么大。事实上，在场的体验或在场效应——因体验缺席的在场和在场的缺席而产生的神圣感和历史的“光晕”——同样受到二者的重视。

对于某些媒介考古学家而言，通过实际参与历史的“原初”时刻(如果“起源”从未存在)，过去的在场于此时此地(部分)显现了出来。若按照瓦尔特·本雅明的描述，“光晕”是一个人与艺术品的独异之处(singularity)(这里指古怪或稀有

的历史人工制品、碎片或踪迹)进行存在主义的相遇^①时产生的神圣体验,那么存在就是神圣的或带有光晕的¹³。然而,对于那些只把在场当作一种效应的媒介考古学家,它依然是神圣的。按照塞缪尔·韦伯(Samuel Weber)的论述,“光晕”是“独异^②之物的独异的告别,其独异之处不再属于一个原初时刻,而是其遗留的余波”¹⁴。尽管过去的转喻的碎片和痕迹不会将过去直接传递至当下,但它们的在场却神圣地回应了它的缺席。因此,在场的话语两端——真实的(如果是局部的)在场或虚幻的在场效应,存在主义的相遇或其遗留的余波——那些之前被忽视、未加思考的转喻的碎片或痕迹,不仅使人们强烈意识到不可复原的更大缺席(被设想为“过去”),而且使人们意识到存在主义意义上在场的“他者性”(它被当作是一种差异,产生于构成我们熟悉的日常生活世界,即“当下”的事物秩序之中,然而该差异可以从秩序中被辨识出来,且与该秩序保持一定距离)。

对于鲁尼亚来说(媒介考古学家也是一样),“在场——与现实的接触……就和意义一样是根本性的。尽管意义可能被描述为……意识、生活的内涵面,在场却被认为是其外延面”¹⁵。因此,涉及史学,“在场栖居于语言的外延区域,……属于为了讲述一个故事而呈现的事物”,而不属于故事本身。然而,内涵和意义常常主导大多数的历史和史学实践。也就是说,即使“史学的外延层面偶被提及,……但史学家如何再现他们考察的东西这一层面总是抢尽风头”¹⁶。因此,在场并不在叙述和意义的层面上显现,而在于细致的描述,这种描述可能是无穷无尽的,在转喻性上总是局部的和开放的,并且优先于通过命名和诠释形成的大致理解。

实际上,当然,通过语言来传达在场,在某种程度上总会涉及内涵和诠释。从史学上言之,就像汉斯·乌尔里希·古姆布莱希特所建议的那样,我们可以期望的最佳情况是“在场效应与意义效应之间的来回摆动”¹⁷。然而,在哲学和方法论上,对于在场的渴望(以及在实际研究过程中该渴望的激发)使一种全新的方法论(和史学)得以产生。这种全新的方法论既是经验主义又是物质主义的,强调定性的描述也常常使用定量描述;它强调事物的“物性”(thingness),毋需诠释性的“阅读”或文化“分析”,而是需要仔细勘察以及(可能的话)触摸、操作和运

① 存在主义心理学认为,生命在关系中“相遇”,彼此了解,从而对存在的经验进行自省。这是一种切实的、真诚的相遇。——译者注

② 独异是韦伯教授阐发的一个重要概念。2016年10月,韦伯教授在北师大就“独异”作了三次主题演讲。其演讲稿现已译成中文,刊登在北京师范大学文艺研究中心主办的学术集刊《文化与诗学》上。——译者注

转研究的客体。同样，史学被转变——构想和著述，（用海登·怀特有效的区分方法来看）使用的并不是诠释这样的叙述行为（narrativized acts），让我们对世界有一个全面的视角，而是发现和描述这样的叙事动作（narrated acts），不仅打开了我们的感官，还提高了我们对世界，尤其是世界始终如一的非连续性，以及我们眼中总是不可思议的“他者”的理解力¹⁸。总而言之，对在场的渴望以及与之相伴的史学研究策略（不管是方法论的还是话语的）很大程度上解释了为何特定类型的反历史研究的出现[我想起了编年史学家，比如费尔南德·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的鸿篇巨著，还有1926年汉斯·乌尔里希·古姆布莱希特的反解释学的和超文本的作品，尽管不是文本主义]，为何近期的历史研究越来越关注其外延而非内涵：物质史、结构史以及司法史（我们可能会这样称呼它）——实际上还有被媒介考古学铸造（和书写）的历史以及跨历史研究¹⁹。

正如我已经论证的那样，在多样化的媒介考古学中，最为根本的基础在于它对上述历史在场之可能性的渴望和信仰。我也已经指出了这种基本原则导致的几种结果（既有哲学上的也有方法论的）。事实上，我一直建议媒介考古学和本书中的文章能站在渴望在场的角度，共同拥有一些“家族”的特征，这些特征将它们联合起来，形成异构的一致性（coherence）。这种一致性既是空间化的，也是概念化的，在字面上与“共同”（co）和“此地”（here）相关，构成一种普世共享的哲学上的惯习（habitus）（其中也有某些内在的差异）。这些大多数已被提及的家族特征，包括对于媒介具体特质的限定，而非一套抽象的概念；媒介（在最广义和动态的层面上）是物质和结构，而非从属于形而上学理论并受其影响的次要“填充物”；作为具体的、工具性的和认识论上的方法，媒介实践和操作的有效性等同于长程分析方法；注重对媒介的物材、形式、结构和操作的描述，而非注重对媒介内容及其社会效果的诠释；媒介在形式和认识论上各有不同，而非经过修正的雷同；最后（至少是在这篇论述中），媒介的多样性破除了历史的连续性和目的论，而非相反。

那么，媒介考古学总体而言“意味”着什么呢？就其全部和最终的“深层结构”而言，我们可以说些什么？如果考虑到媒介考古学的价值在于作为一种未建制的学科，它努力抵制了任何一种综合的解释或统摄一切的理论，也许我们就不应就此发问。然而，本书的编者不仅要求我提出这些问题，还要求我尽力回答。所以，总的来说（这句话深具反讽意味），我想通过海登·怀特的《元历史》来综观媒介考古学的“历史想象”（以及这本书中的文章）²⁰。就如书中所说，媒介考古学把自己描述为一种特殊的历史类型。尽管它表面上是拒绝叙事化的，但它在深层结构上是情节化和形式论证的，且有着意识形态的蕴涵。

“情节化”模式，或者说何种类型的整体历史被讲述（不论是历时性还是共时性的，不论是叙述其结构的转变还是连续性），对怀特来说，导致了不同的“解释模式”：历史作为一个整体，在深层结构上是浪漫式的、讽刺式的、喜剧式的和悲剧式的（其中部分而不是全部模式，很可能是以形容词的方式与其他模式联系在一起）。尽管我很确定，许多媒介考古学家出于其经验主义和物质主义思想，一想到这些便会嗤之以鼻。但我而言，媒介考古学的原型情节显然是浪漫式的。浪漫剧在根本上是复兴、复原和拯救之剧目（在这里，怀特提及寻找圣杯的传说似乎并非巧合——这个中介性的宗教人工制品，就像历史的媒介人工制品一样，蕴虚于实，是一种“缺席的在场”）。用怀特的话来说，浪漫剧也是一种“人类最终超脱于自己因为原罪堕落而被囚禁的世界……战胜死亡的黑暗力量”的剧目²¹。因此，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将史学家和史学视作浪漫的，只要他们的主要目的是通过复兴、复原和挽回“过去”以超越人类的死亡宿命。比如，儒勒·米什莱(Jules Michelet)“呼吸着死亡的尘埃”^①，以及 E. P. 汤普森(E. P. Thompson)重现和书写英国贫苦大众的声音^②。

媒介考古学的情节化模式在我看来似乎尤其浪漫。它遵循历史唯物主义，偏好反解释学，坚持媒介的多样性、特异性和差异性，并且主要基于过去在当下“在场”的可能性。但就如《宋飞正传》中(*Seinfeld*)带有讽刺性的纠正那样，“并不是说那有什么错”^③。事实上，考虑到我们身处这一怀疑和讽刺的时代，浪漫的世界观通常不仅被认为是幼稚的，而且有着潜在的危险。因此，那些媒介考古学家把历史在当下存在的“现实”作为一种在场的“效应”。然而，这些媒介考古学家依然是浪漫主义者，即使同时进行着自我讽刺。事实上，怀特写到，尽管他无法想象一部浪漫的讽刺剧，但他可以“合理地想象一种讽刺性的浪漫剧”，这意味着“一种表现形式，它意在从反讽的立场揭示对世界进行浪漫式构思的愚蠢行为”。在此情况下，对“现实”存在的浪漫观念尽管愚蠢，至少部分人依然坚持这样的观点，当然也有部分持否定态度。也就是说，即使是那些把“在场”仅限定为一种“效应”的媒介考古学家也能有所收获。

怀特认为，历史想象的深层结构中的第二个要素是“形式论证”模式。它是

① 儒勒·米什莱是19世纪法国著名历史学家，被学术界誉为“法国最早和最伟大的民族主义和浪漫主义历史学家”，还被誉为“法国史学之父”。在其散文《会唱歌的夜莺》中，米什莱描绘了一只“不恼恨”“屏声静气”地迎接死亡的夜莺，以表现艺术家对世俗的悲哀及其光辉的灵魂。——译者注

② E. P. 汤普森是英国第二代文化研究学者，著有《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关注平民文化。——译者注

③ 《宋飞正传》里面的杰瑞(Jerry)和乔治(George)每次说自己不是同性恋后都要反过来补充：“并不是说那有什么错。”这句台词是整部剧最令人印象深刻的金句，是对极端政治正确性的讽刺。——译者注

一种将不同话语加以组合的原则，明确或隐含地表达了对于历史现实及其编撰形式的不同观念。在这里，怀特区分了“形式的四种范式，即某种被看成推理性论证的历史解释可能想到而采用的形式，它们分别是：形式论的、有机论的、机械论的、情境论的形式”²²。媒介考古学的形式论证模式主要是“形式论的”，即，它的主要目的是“识别存在于历史领域内客体的独特性”²³。继而，作为形式论的媒介考古学，可以与相关的电影与媒介研究、文化研究的当代话语（其形式论证模式主要是情境论）区分开来。也就是说，情境论关注的是构成历史领域“图景”的要素之间共时的、结构化的关系。（尽管在电影和媒介研究中，对特定电影和/或导演作品的分散而细致的研究一度也优先使用形式论的模式，但这个模式已被情境论取代。）

就如情境论一样，媒介考古学避免了有机论的综合与合成原则[在这里，我不禁想起了埃里希·奥尔巴赫(Erich Auerbach)的《摹仿论》(*Mimesis*)中微观与宏观之间的关系^①]，也避免了机械论的综合与还原的关键法则（当然，这里我想到了马克思的《资本论》，及其关于经济与社会结构关系的“规律”）。同样，和情境论一样，媒介考古学的范围本质上是宽广的、分散的。也就是说，所有的媒介（定义宽泛，如“旧的”“新的”和想象的媒介）都是考古学这座磨坊里的谷物。但是，媒介考古学和情境论的不同之处在于，媒介考古学的目的是消除媒介对象之间的相似之处，以及将其视作潜在的、跨历史的，即不必依赖于语境的对象。最后，可能也最重要的是，媒介考古学主要的形式论目的（和呼吁）不是归纳总结（就像我此刻正在做的那样），而是在不完全忽略语境的前提下，“描绘出历史领域的多样、多彩与活力”。这种描绘（或外延的描述）通过转喻的形式，致力于唤起这里所强调的“在场”感，或“在场效应”（对于读者而言）。

在怀特看来，历史想象的深层结构中最后一个要素是“意识形态蕴涵”模式。他论证到，每一件历史作品“都声称已经洞悉：历史记录在某些方面形式的一致性带来了关于历史世界和历史知识自身本质的理论。它们有着某种意识形态蕴涵，试图理解‘在场’，也不管这种‘在场’如何被定义”。因此，在某种特别的情节化模式与形式论证模式之间的选择（和关系），有着意识形态和伦理的蕴涵，即如何使“一个人能够合理地设想，无限期地改变那个在场或者……保持其在场

① 埃里希·奥尔巴赫的《摹仿论》是一部野心勃勃的作品，它的副标题是“西方文学中所描绘的现实”。论著自荷马史诗起笔，一直写到了托马斯·曼的《魔山》与乔伊斯的《尤利西斯》。从它的体例上看，奥尔巴赫先是摘抄一段原文文本，树立论述的靶子，然后以深厚的语文学和细读功夫以点带面辐射出去，与同时期的或历代文本进行比较，往往能得出令人惊喜的观点。——译者注

的形式”²⁴。进而，在深层结构的层面上，且不考虑明确的意识形态话语或历史学家自觉持有的政治信仰，每一个史学项目都蕴含着怀特认定的四种基本“元政治”立场：无政府主义、保守主义、激进主义、自由主义。拥有这些立场将引发对社会变化的需求（和速度）以及对当前社会建制之价值观的相异观点。

如果我们能够理解以下这点，即在今日，在被称为“学术界”的社会（有时是反社会的）专业建制中，历史、历史研究和史学都是必要的和“学科化”的，那么我们必然要思考这一问题：在这一语境下，媒介考古学的深层意识形态（和伦理）取向是什么？在这里，媒介考古学的未学科化状态尤具辩证性。换言之，一方面，媒介考古学讲述了一个无政府主义的故事——它很少关心“历史建制”，反对历史建制的结构系统，并倡导独立个体的异质“共同体”。这些个体由于一些多样化且共有的历史兴趣、信仰和实践，具有相同的惯习。另一方面，媒介考古学也讲述了一个自由主义的故事。它能与历史建制轻松共处，并且坚信自由主义将回应媒介考古学对建制的认识论前提和实践方法所作出的“调适”。对怀特而言，无政府主义“倾向于在历史描述中运用本质上是浪漫主义的移情技巧”。然而，自由主义倾向于以“理性”的观点看待社会变化，“在整体的个别部分而不是结构关系产生变化时，变化本身才被视为是最有效的”²⁵。尽管怀特发现，在浪漫式的历史情节、形式论的历史论证与无政府主义的意识形态蕴涵模式之间有着亲和关系，但对他而言，自由主义和讽刺式、情境论才是结合最紧密的。然而，这只是一些主要的亲和关系，并非带来既定历史类型的必要组合。事实上，怀特总结到，最有趣且丰富的历史具有以下特征：“具有一种辩证的张力，这种张力往往来源于这样一种努力，即将情节化模式与和它不相协调的论证模式或意识形态蕴涵模式结合在一起。”²⁶ 总而言之，我想提出的是，媒介考古学在意识形态上，以及就媒介考古学与那些已建制的学科（历史学、电影与媒介研究、文化研究）的自由组合和差异而言，保留了未学科化的无政府主义状态：它致力于一种在场的话语（不论是浪漫式的，还是反讽式的），该话语对这些学科的认识论规范和既定价值观提出了重大挑战。

— 注释 —

The epigraphs for this chapter are taken from Eelco Runia, “Presence,” *History and Theory* 45 (February 2006): 1, and Bjørnar Olsen, “Material Culture after Text: Re-membering Things,” *Norwegian Archaeological Review* 36(2003): 100, quoted in Ewa Domanska, “The Material Presence of the Past,” *History and Theory* 45 (October 2000): 34.

1. Although perhaps most associated with historiography, the issue of “presence” spans disciplines. See, for example, the literary theorist and philosopher Hans Ulrich Gumbrecht’s two (quite different) yet prescient volumes, the hypertextual and “immersive” *In 1926: Living on the Edge of Time*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and the more conventionally written *Production of Presence: What Meaning Cannot Convey*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After its publication of Runia’s “Presence” in early 2006, *History and Theory*’s next issue focused on the topic; see *History and Theory* 45 (October 2006). Stanford University’s Critical Studies in New Media workshop also focused on “presence” during 2006–7, and in May 2007, in association with the Stanford Humanities Center and Lab and the Archaeology Center), it held an interdisciplinary colloquium, “The Politics of Presence.” See the homepage of Critical Studies in New Media at <http://humanitieslab.stanford.edu/44/Home> (accessed July 15, 2009).

2. Although the allotted space for this “Afterword” does not allow me to address directly the essays that make up this anthology, in the context of this particular definition of *presence* I would point out that, opposed as they may superficially appear, Huhtamo’s essay on discursive topoi and Ernst’s essay on technology as itself archaeological and archival share the premise of a *concrete* transhistorical transference of “presence.” Both Ernst’s technological artifacts and Huhtamo’s topoi are privileged as *sites of storage and retrieval*. Indeed, Runia notes that the rhetorical idea of topoi traditionally included both storage and retrieval. As he writes: “For Vico indeed, ‘topics’ is at least as much about ‘finding’ as about ‘shelving.’” Further, “Vico defines topics as ‘the art of finding in anything all that is in it.’” Runia, “Presence,” 13.

3. Domanska, “Material Presence,” 348.

4. See Martin Heidegger, “The Question Concerning Technology,” in *Martin Heidegger: Basic Writings*, ed. David Farrell Krell, trans. William Lovitt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1977), 287–317. Heidegger writes, “Technology is... no mere means. Technology is a way of revealing” (294). And he also connects this revealing power of *techne* with art and *poiesis*, ending with: “Thus questioning, we bear witness to the crisis that in our sheer preoccupation with technology we do not yet experience the coming to presence of technology... Yet the more questioningly we ponder the essence of technology, the more mysterious the essence of art becomes” (317).

5. Carolyn Steedman, “In the Archon’s House,” in *Dust: The Archive and Cultural History* (New Brunswick: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2002), 1. In the discussion from which this quotation is drawn, Steedman refers to both Derrida and Foucault and their “intermittent dialogue” on “the archive as a way of seeing, or a way of knowing; the archive as a symbol or form of power” (2).

6. Hayden White says in an interview: “The idea that you could have an experience of a past phenomenon—an experience of the presence of the past—can only be an illusion. It’s a contradiction in terms. But you could get the illusion of presence, and this is what [Frank] Ankersmit, I think, has in mind. Ankersmit no longer speaks about having an experience *of* history, but has an experience *about* history, of *historicality*... A museum display [as] an attempt to give an experience *of* history... left him kind of cold. A memorial to dead children, he says, was an experience *about* history.” Note here the casual yet telling criterion of the illusion’s *affect* (it doesn’t leave you “cold”) as an element of the “presence effect.” Hayden White quoted in Erlend Rogne, “The Aim of Interpretation Is to Create Perplexity in the Face of the Real; Hayden White in Conversation with Erlend Rogne,” *History and Theory* 48 (February 2009): 73.

7. See Roland Barthes, *Camera Lucida: Reflections on Photography*, trans. Richard Howard (New York: Hill and Wang, 1981), 42–59. Barthes writes: “However lightning-like it may be, the *punctum* has, more or less potentially, the power of expansion. This power is often metonymic” (45).

8. Eelco Runia, “Spots of Time,” *History and Theory* 45 (October 2006): 309. Metonymy is of central importance to the discourse of “presence,” particularly as developed by Runia (“Presence”) to

counter what he argues are the *metaphoric substitutions* effected by realist historical narrative to achieve “meaning.” That is, realist historical narrative substitutes *as a whole* for the past and proceeds on an underlying claim of *analogy* or *similitude* to it (i. e., this is the same as and/or equal to that by virtue of a metaphysical idea of resemblance). The relational logic of metonymy, however, insofar as it is based on *partiality* (i. e., this is related to that by virtue of existential contiguity, association, or shared attribute rather than resemblance), preserves *difference*: the container is not of the same “stuff” as the contained; the part is not of the same “stuff” as the whole. To further the link between metonymy and “presence,” it is also worth emphasizing (as Runia doesn’t) the difference between *metonymy* and *synecdoche*. Both are often confused because the relational logic of each is based on partiality. Metonymy differs from synecdoche, however, in that its relation of part to whole is not based, as is synecdoche, on the *abstraction* of the part from an *organic ensemble* or whole (i. e., the acorn for the oak). Rather, metonymy (to quote Paul Ricoeur) “brings together two objects each of which constitutes ‘*an absolutely separate whole*’” (i. e., the crown for the king). See Paul Ricoeur, *The Rule of Metaphor: Multi-disciplinary Studies of the Creation of Meaning in Language*, trans. Robert Czerny, Kathleen McLaughlin, and John Costello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1977), 56; for discussion of distinctions among metaphor, metonymy, and synecdoche, see 56–58.

9. Runia, “Spots of Time,” 313.

10. Giuliana Bruno, *Atlas of Emotion: Journeys in Art, Architecture, and Film* (London: Verso, 2002).

11. Runia, “Spots of Time,” 309.

12. An example of what I mean here is an essay I published in 1999 (and written earlier) on a then relatively *new form* of media—QuickTime “movies” made on and for the computer—constituted and constrained by limited computer memory. In the piece, if ironically, I regard both the form and the constraints of these little QuickTime artifacts as *already relegated to the past* insofar as the present was then fixed on achieving the computer memory and speed to allow for “streaming.” I was prescient insofar as few (if any) of the works made in this mode remain. See Vivian Sobchack, “Nostalgia for a Digital Object: Regrets on the Quickening of QuickTime,” *Millennium Film Journal* 34 (Fall 1999): 4–23, later abridged under the same title in *Future Cinema: The Cinematic Imaginary after Film*, ed. Jeffrey Shaw and Peter Weibel (Cambridge, MA: MIT Press, 2003), 66–73.

13. See Walter Benjamin, “The Work of Art in the Age of Mechanical Reproduction,” in *Illuminations*, ed. Hannah Arendt, trans. Harry Zohn (New York: Schocken Books, 1968), 217–51. Of particular relevance to media archaeology and its historical objects (which here can be substituted for “the work of art” in the following quote), Benjamin writes; “The uniqueness of a work of art is inseparable from its being embedded in the fabric of tradition. Tis tradition itself is thoroughly alive and extremely changeable” (223).

14. Samuel Weber, “Mass Mediauras, or: Art, Aura and Media in the Work of Walter Benjamin,” in *Mass Mediauras: Form, Technics, Media*, ed. Alan Cholodenko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104–5, second instance of emphasis mine.

15. Runia, “Presence,” 5, emphasis mine.

16. Runia, “Spots of Time,” 315, emphasis mine.

17. Gumbrecht, *Production of Presence*, xv.

18. Hayden White productively distinguishes between “narrativization” and “narrating”: “When you impose a narrativized vision of the world on the world, I call it narrativization. . . . Narration is the act of speaking. Any time you speak in the first person about a thing in the world as a thirdperson mode of existence, you’re narrating.” Quoted in Rogne, “Aim of Interpretation,” 68.

19. The other major academic contributions to the emergence of these new approaches to historiography can be attributed to both cultural studies and the “new historicism.” Nonetheless, insofar

as both these approaches tend to regard the “world as a text” (i. e., a coherent if complex *symbolic* system) that can be “read” and interpreted, they become precisely what the discourse of “presence” challenges, both epistemologically and for “equal time.” Just as important to the emergence of this new discourse has been our increasing relations with the “virtual” and, hence, an increased longing for the “real.”

20. Hayden White, *Metahistory: The Historical Imagination in Nineteenth-Century Europe*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73). See, particularly, “Introduction: The Poetics of History,” 1–31. Although White is dealing with nineteenth-century European historians, he makes the case that the taxonomic method he employs for the “deep structural analysis of the historical imagination” might well be relevant to other periods; furthermore, he limits his taxonomy’s relevance to historical narratives only, pointing out that these are particularly constrained—not only by the external constraints dictated by their object of study (past historical events) but also by their purportedly realist representation of these objects (these events happened and in this specific way). See 8 n.

21. Ibid., 9.

22. Ibid., 13.

23. Ibid., 13–14.

24. Ibid., 21.

25. Ibid., 26, 24.

26. Ibid., 29. Given my gloss on the affinities of media archaeology, it is apt in this context that White uses, as a major example in his book, the “inconsonance” of Jules Michelet, “who tried to combine a Romantic emplotment and a Formist argument with an ideology that is explicitly Liberal” (29).